

试论种姓制度对印度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熊 杰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4)

【内容摘要】印度种姓制度历史悠久,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如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印度正在经受城市化浪潮的洗礼。因此,为了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正在快速崛起的邻国,本文试图从种姓制度这一社会文化视角来探讨其带给印度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关键词】种姓制度 印度 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D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4-0176-03

一、印度种姓制度

印度种姓制度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印度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

早在梨俱吠陀时代(公元前1500—900年),来自欧洲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开始逐步进入印度次大陆并且征服了当地的黑皮肤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根据最古老的吠陀文献《梨俱吠陀》,雅利安人的本意为“高贵的人”,被征服的土著居民被称为“达萨”,意为“被征服的敌人”。^{[1][P19]}后来在阶级分化和奴隶制度形成过程中,原始的社会分工形成等级化和固定化,逐渐形成严格的种姓制度。

根据种姓制度,印度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即僧侣,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等,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为第三种姓,从事商业贸易;首陀罗即农民,为第四种姓,地位最低,从事农业和各种体力及手工业劳动等。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不可接触者”或“贱民”,绝大部分为农村贫雇农和城市清洁工、苦力等,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根据东晋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的记载,贱民“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毕。人则识而避之不相搪。”^[2]

印度人口众多,82%为印度教徒,其中分为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种姓制度主要存在于印度教中,对伊斯兰教和锡克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种姓制度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并与印度的社会体系、宇宙观、宗教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可说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

1947年独立后,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消除种姓歧视。1948年国会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议案。后来宪法和各邦法律也都做出相应规定,印度宪法第15条规定,

“任何人不得因种姓、种族、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视”;第17条还明确规定废除“不可接触制”。印度还实施了著名的“保留政策”以保证低种姓人的教育和就业权利。根据“保留政策”,政府在议会两院为他们保留一定比例的席位,而且在所有的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他们保留相当多的职位。此外,还在高等学校中给低种姓学生保留一定的入学名额。然而,延续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在现代印度社会中仍然根深蒂固,在现阶段对于包括城市化进程在内的印度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人类工业文明发展中一个必经阶段。1800年全球人口城市化率仅为3%,1850年为6.4%,1900年为13.6%,1950年为30%,到2000年已经上升到47.4%。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到2009年,已有5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3]作为世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的印度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在未来的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的研究显示,2025年,印度城市人口将占到该国总人口的37%。^[4]

三、本文研究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既是国家政策、国际环境等多种政治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和该国的文化、历史、宗教等人文因素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和我国一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和几千年来厚重的文化积淀有着密切关联。我国和印度有着数千年的交流史,印度的宗教、音乐、绘画、文学等对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印度既是我国非常重要的邻国,又和我国一样同为正在快速崛起的重要新兴经济体,我们有必要多角度来了解这个国家。因此本文选择了种姓制度这一颇具印度特色

* 作者简介:熊杰(1967—),女,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研究与印度社会文化研究。曾多次到访印度各地高校和公司,长期从事国际合作和中印文化教育交流工作。

的角度来考察其对于该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四、印度城市化进程中种姓制度的影响无处不在

1. 种姓制度的余毒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人口流动和城市治理的经验教训”考察团于2010年发布的考察报告称,印度的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20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的城市化率高于包括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90年代以来印度的城市化率却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05年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水平为29.95%,比印度高出1.26个百分点。如果与不包含印度在内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水平相比,则印度的城市化率水平差距更大。不包含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国家2005年城市化率为31.05%,比印度高出2.35个百分点。^[5]

另外,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07”公布的数据,1990年印度城市人口比例为25.5%,2005年为28.7%^[6]。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表示,在2008年,据估计只3.4亿印度人居住在城市,约占总人口的30%^[7]。由此可见,印度城市人口18年间仅仅增长了百分之四,增速相当缓慢。此外,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球平均有50%的人居住在城市,在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更是达到了约75%,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为45%,即使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比例也在37%。^[8]由此可见,印度的城市化率在全球几乎是最低的,甚至有中国学者认为印度仍然是一个农村社会。^[9]因此,从国际层面上比较,我们可以判定印度城市化水平非常低且速度非常缓慢。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透过印度社会纷繁复杂的表象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在其中的影响不可忽视。

种姓制度的有力精神支柱是婆罗门僧侣所创造的印度世俗社会法则“达摩”(Dharma,法)。根据这一法则,各个种姓有各自的行为规范(达摩)。^[10]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本种姓的行为规范做事、说话和思想。婆罗门利用“灵魂轮回”和“因果业报”来支撑达摩理论。如果严格遵守了本种姓的达摩,就是造了善业,来生就可以上升到高一个种姓;反之,就是造了恶业,在来世会受到恶报,转世到更低的种姓甚至畜牲,即使在今世也要受到惩罚(如逐出种姓)。如果自己是低级种姓,这是“梵”(神)的安排,因果业报的结果。只有放弃最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认命安于现状才符合“梵”的意思,来生才能进入高一等种姓。

印裔英国作家V·S·奈保尔这样抨击印度的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在印度,人类的堕落是经过缜密的测量和界定的,就像绘制地图一样,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印度的亿万普罗大众是不可能被分类、被评定等级的。”^[11]

当然达摩理论在现代印度社会的影响已有所减弱,尤其是对于大城市的精英阶层。然而在偏僻的乡村,许多农民对于达摩理论仍然深信不疑。在这些农民看来,要摆脱此生的贫困和低级种姓,只有按照“梵”的安排,安分守己在乡村劳作,不要去考虑进城打工赚更多的钱,除非实在没有其他出路。

正是由于宿命论的影响仍然强大,农民缺乏迁移进城的动力,在一定程度迟滞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从而导

致了印度的城市化进程缓慢而且城市化水平较低。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人口流动和城市治理的经验教训”考察团的报告,在印度城镇人口增量中,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占最大的比例,是印度城镇人口增长主要因素,这是印度城市化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一般而言,城镇人口增长的三大因素分别是:人口自然增长、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和城镇地域范围的重新划定。根据印度199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1971~1981年期间印度城镇人口增量中,大约41%左右是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36%左右是农村向城镇迁移以及城镇建设范围扩大所致。但是在1981~1991年期间,两个比例分别变化为60%和22%。^[5]

由此可见,由于种姓制度而形成的宿命论,使得人们没有积极性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没有积极性去努力追求财富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导致了许多的农村劳动力不愿意向城镇迁移,而这与现代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要求格格不入,在客观上对于印度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2. 在种姓制度的作用下,在印度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增长相对较快

服务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涵盖了多个行业,如软件业、通信、银行、医疗业和宾馆等等。印度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增长速度快于其他产业。1961~1990年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5.25%;1991~2005年提高到7.92%。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和农业。制造业增加值在1961~1990年年均增长率为5.5%;1991~2005年则仅提高到6.15%。农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两个时期分别为2.4%和2.6%。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61年的34.3%提高到1991年和2005年的42.1%和54.4%,而制造业的比重,2005年为27.3%,仅比1991年的水平提高了不到一个百分点。^[5]

在印度的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是企业服务外包和信息产业部门。该部门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年增长率接近20%。印度拥有400万科技人才,号称世界第三大科技大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12]。位于南印度的班加罗尔被称为印度的“硅谷”。许多世界级大公司如通用电气、甲骨文甚至包括中国的华为等等纷纷在印度开设研发中心或者全球寻呼中心。因此印度又被称为“世界办公室”。让我们来看看两家印度软件业领军企业的情况以便了解印度软件业一斑。TCS是印度最大的企业Tata集团旗下的软件公司,在全球42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拥有18000名员工,并且在孟买证交所上市。^[13]成立于1981年的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号称是“下一代”信息技术的全球领导者,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为全球2000多家企业提供软件服务,拥有133,560名员工。^[14]

为什么在印度城市化进程中以软件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取得的成就远远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呢?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政府政策支持、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能够深刻理解英美的商业文化、上世纪末以来席卷世界的“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全球化、高水准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学毕业生英语水平高沟通成本低等等。通过深入研究印度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我们还必须看到支撑这一现象的独特的社会文

化基础——种姓制度。

信息业对于从业者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如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和计算机类高等教育背景。如本文前部分所述,印度各个种姓的生活要遵守“达摩”的要求。一个人能够从事什么工作取决于他的出身。种姓制度在经济学上表现为一种以宗教为中介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制度是世袭的。按照婆罗门、刹帝利等高等种姓的“达摩”,他们不能够干属于低种姓人们的体力劳动(当然这种法则现在也有被打破的时候,如也有贫穷的婆罗门为较低种姓的富裕家庭做佣人。但是,他们不会做打扫马桶之类的事情。主人一般也不强求)。如果必须在失业和从事体力劳动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因为如果与低种姓的人去竞争诸如清扫、修理等体力工作会被人鄙视。因此,高种姓家庭远比低种姓家庭更加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从事和自己高贵种姓匹配的高尚工作,他们有着非常强大的内动力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那么支持子女求学的经济基础从何而来?让我们来看看印度社会的亲族观念。“印度教社会强调亲族观念”^[12],要求要求做到长幼有序、礼数周到。“和舅父、伯叔、岳父、祭司、教师谈话时,如果他们比自己年青,应该起立说:‘是我’。对姑母、姨母和姐姐,要有和对母亲一样的礼数。”^[13]。在这种深厚的血浓于水的背景下,高种姓父母有能力动用自己血缘和社交圈内的各种经济资源来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因此现在的情况是在印度的IT行业中,高种姓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的职位。

与此同时,印度的制造业却由于管理体制、企业经营、基础设施落后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原因的制约,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制造业的人力基础是大量的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劳动力。而印度全国识字率只有65%^{[14](P39)},受过初等教育和初、中级职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缺乏,不能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合格的充足的劳动力,从而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如下两点:

1.由于尼赫鲁总理的一个颇具争议的政策,印度政府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将大量的资金投入为精英阶层准备的英语教学的大学,每年培养出100万名工科毕业生。然而为社会底层的人们服务的基础教育却资金缺乏,从而导致了全国识字率只有65%。

2.受“达摩”理论的影响,低种姓缺乏接受教育的强烈内动力。由于印度社会各个阶层向上流动的管道细小,低种姓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安分守己。低种姓人士往往认为“种姓是命中注定,是自己前生所作的业造成今生的果,只有安分守己、忠于天职,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15]因此,人们都恪守种姓的规范。如果祖辈从事低贱的工作,那么自己只有认命继承这一工作。在他们看来教育不是为他们这类人准备的;一个人应该从事什么职业早就由出身决定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许多低种姓家庭没有非常强烈的教育改变命运的观念,低种姓子女的教育便变成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

客观而言,种姓制度提供了源源不断地的高种姓精英劳动力,促进了印度的服务业的繁荣。但是其带给普通劳动者的负面生活理念影响非常巨大,他们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缺乏与不幸人生抗争的动力与信心,安于现状,不重

视教育,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印度制造业缺乏合格的人力资源,限制了制造业的发展,从而产生了城市化进程中,以软件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增长远远超越制造业的情况。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印度独特的种姓制度,其城市化进程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例如,虽然印度的服务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增速远超制造业,整个印度信息技术服务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仍然不超过100万个,世界一流的信息产业只是给少数精英阶层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信息技术产业遥不可及,他们并没有分享到这一欣欣向荣的产业所带来的果实。笔者认为,只有当印度社会真正地摆脱种姓制度的阴影,让全体人民实现真正的平等,并将制造业的发展放在国家战略的最重要位置,让印度既是“世界办公室”又是“世界工厂”,使“印度制造”如“中国制造”一般成为印度一张响当当的国家名片,让广大普通劳动者能够在“印度制造”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获得财富,印度的城市化才能够追赶上世界的步伐。当然这一切都需假以时日。

参考文献:

- [1]杨浩勇.印度能够超越中国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 [2][东晋]法显.佛国记[EB].<http://www.dushu.com/showbook/100307/1011876.html>.
- [3]August 18, 2011, available from. <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urban-development>
- [4]The ‘Bird of Gold’: the Rise of Indian Consumer Market,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P.65, July 26, 2011, available from http://www.mckinsey.com/mgi/reports/pdfs/india_consumer_market/MGI_india_consumer_chapter_3.pdf
- [5]刘培林.印度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J].城乡建设,2010(10):76.
- [6]World Bank(2007),“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2007”, P.150.
- [7]India’s Urban Awakening: Building Inclusive Cities,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July 19, 2011, available from http://www.mckinsey.com/mgi/publications/indian_urbanization/index.asp
- [8]王红生.印度城市化进程缓慢原因探析[A].北京:第四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C].2006:65.
- [9][英]V·S·奈保尔.李永平译.幽暗国度[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5.
- [10]August 7,2011, available from <http://www.tata.com/company/profile.aspx?sectid=YrxJG1Zt1BU=>.
- [11]August 7,2011, available from <http://www.infosys.com/about/what-we-do/pages/index.aspx>.
- [12]宋海啸.印度民族性格及其对印度国家的影响——以印度教民族为中心[J].世界民族,2010(10):92.
- [13]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摩奴法典[Z].49.
- [14]爱德华·卢斯.张淑芳译.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 [15]薛克翘.印度民族凝聚力浅说[J].南亚研究,2002(2).